

编者按

这是一段 60 年的奋进路，这是一场几代人的接力赛。也许，我们曾因时代的潮汐转换过运行模式，也曾因社会的变革调整过探索角度，但是，在这场接力赛中，始终不变的，是我们一脉传承的精神内涵与梦想，是我们探索未知的攀登姿态与执念。值此社庆节点，老中青几代报人共忆和中国科学报社并肩共进的携手岁月，讲述他们坚守阵营的故事，披星戴月的苦乐，还有那溢出版面之外的温暖和感动……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



郭传杰 1995—2000 年任中国科学报社社长、总编辑

问：《中国科学报》已经走过一甲子。在这生日时刻，你想对她说点什么？ 郭传杰：《中国科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一份科技报纸。从它作为中科院院报的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科学院共甘苦，与人民共和国同命运。60 年来，有鲜花阳光，也有风霜雨雪。代代报人，撒花酿蜜，在科技界及全社会的关爱支持下，记录历史，创造辉煌，成为我国科技发展不可替代的见证和助手。我一直为它的忠实读者。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又兼职做过一点工作，属于她的编外一员。个人生涯能与她的事业结缘，凭借她的平台和影响，为科技界、为读者尽点绵薄，我深感荣幸。 问：《中国科学报》为我国科学新闻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起伏。从历史的眼光看，你如何评价？ 郭传杰：这是个老问题，值得总结；但又是个大问题，个人难以尽言。传媒是历史的记录者，同时一份报刊也在创造自己的历史。

报纸的特色是其品牌的构成元素之一。讲理性，讲科学，求真务实，既是科学的风格，也应该是科学类报刊的品格特征。几十年来，《中国科学报》以此作为立足之本，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曾经对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的科学家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80% 的中国科学家认为，《中国科学报》的科技新闻报道最可信。说实话，讲实话，“得”，最可宝贵的传统与财富，最须坚守的办报特色，最须弘扬的品牌力量。此其一。其二，办报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前提条件。回望这半个多世纪，多数时段不错，它的发展也比较健康，开本由小到大，版数从少到多，刊期由稀到频，发行从内到外，但是也有过停刊的苦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类科学报刊是否应该完全推向市场的问题，一直处于探索的过程中，经费条件对它的发展方向 and 路径影响也不小。当然，过去的探索是必要的。现在国家建设和科技发展

展进入了新的时代，我期待并相信《中国科学报》会有一个稳定支持的更好的发展环境。 问：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讲，弘扬科学精神极为重要。《中国科学报》在这方面应该如何担当？ 郭传杰：的确，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多与科学精神缺失有关。《中国科学报》是沟通科学与科学界的重要通道，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对老鼠药、水变油、科研不端行为等的揭露与批评，起到了引领性的巨大作用。我感到，在弘扬科学精神方面，报纸近年来的取向是对的，但态度似乎“温和”了些。对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道德、原始创新环境以及某些与科技战略相关的重大问题，是否可以出点题目，与有关部门或机构联合，组织一些专题讨论或笔会，并鼓励不同观点交锋。以科学精神来弘扬科学精神，在科学实践中弘扬科学精神，效果会更好。 问：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你认

为中国科学报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应该在新闻宣传战线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郭传杰：新科技革命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传媒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大大拓展了科学传播的时空观。面对这一态势，中国科学报社应该勇于迎接变革，积极贯彻“移动优先”的国家战略，树立互联网思维，创新科学新闻的传播报道方式。同时，在内容制作方面，利用 VR、AR、MR 等各种新技术手段，补齐音视频报道能力方面的短板。图、文、音、像多种形式并用，走多媒体融合之路，与时俱进，满足受众新的信息需求。 作为中科院主管、以“科”字为标识的重要传媒，有近水楼台的优越条件，只要对技术创新成就有更高的应用热情和敏感性，有相关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密切合作，有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中国科学报社定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并在新闻宣传战线发挥领头羊作用。 (林珺、张婧整理)

在这里，我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十年



王鹤山 1980—1989 年在中国科学报社工作，任副总编辑

我 1964 年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政治部保卫局工作，十年动乱伊始，保卫局撤销，我到当时新组建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震办公室《地震战线》当编辑（后地震办公室改建为国家地震局），1980 年我又回到中国科学院，在政策研究室下设的《科学报》（《中国科学报》前身）编辑工作。此后十年，无论是在编辑岗位还是副总编辑岗位，我一直负责版面的选题策划工作，有幸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科学报》蓬勃发展的十年。 上世纪 80 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社会各个方面发展都方兴未艾。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报》的工作也不例外，我和同事们都想趁着改革的春风把《科学报》办得更好、更有特色。 我们达到的第一个共识就是，《科学报》要从院内扩展到院外，要走向社会，真正发挥中国科学院对社会的影响力。以前

的《科学报》只在中国科学院院内发行，类似于内部资料交流。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把 4 开 8 版小报改回对开大报，每周一期向社会发行。 没想到改版伊始社会征订就达到了 5 万份，全社上下欢欣鼓舞。自此，“立足科学院，面向整个科技界”成为我们的办报宗旨。这次改版极大地鼓舞了报社同仁的信心，我们开始想如何把《科学报》办得更好，原来面向院内发行是一回事，而面向社会发行则需要新点子、新做法。要把报纸办出我们自己的特色，让科技界人士和社会各界愿意看。尝试打破局限，就要不仅仅囿于报道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科研成果，而要真正关注社会问题。 正值此时，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一位年轻人来到我们编辑部投稿了一本《国情研究与对策》的小册子，这位年轻人

就是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的胡鞍钢。《国情研究与对策》的稿子讨论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遇到的资源、生态、环境、粮食、人口、科技人才匮乏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到的实情，也确实关系到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良性发展。《科学报》创刊伊始就刊登过该研究的摘编文章，借此开展了国情问题大讨论。这在当时全国报界尚属敢为人先的尝试。即便当时外界有质疑我们宣传国危论论调的声音，我们也在当时中科院领导的支持下顶住了压力，坚守了《科学报》实事求是的办报方针。 在某次选题会上，大家关注到当时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考研究生，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就想挣钱、做买卖、参加工作。当时“读书无用论”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科技人才的断层对国家发展来说是严重的问题。我们随即组织记者开展调查走访，相关报道在头版头条上刊发后得到了很多学部委员

关注。类似这样关注科教界社会话题的选题让《科学报》的立足点更高了。 我们还坚持百家争鸣的办报观。1986 年 4 月，长江三峡建设正处于论证阶段，编辑部接到一些学部委员来信来稿，对长江三峡建设的水库地质是否牢固、泥沙沉积等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我们组织了相关版面围绕长江三峡工程开展讨论。这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国务院为此专门组织工程专家召开了三峡工程论证会。可以说，三峡工程的系列讨论为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 翻看如今的报纸，我欣慰地发现，《中国科学报》依然坚守着自己科学性的传承，关注科教界的大问题，成为了国内外了解中国科学发展的一扇窗口。 (本报记者韩天琪整理)

在这里，我们尝试了走向世界



温瑾 1986—2005 年在中国科学报社工作，任《侨报·中国科学周报》主编

《侨报·中国科学周报》是中国科学报社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虽然只存在了 5 年时间，但却是把中国科技政策、事件传到海外的一次有益尝试。 1997 年，中国科学报海外版报社与中国科学报社合并，改名为《中国科学报海外版》，仍为月刊，八版，通过使领馆给美国、欧洲（英国）等免费送出数千份。 1999 年，适逢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被派到美国任侨报社社长，在中科院办公厅、外事局、中国科学报社（时称科学时报社）社长罗秉兴等方面的协商下，侨报社与中国科学报社达成合作协议，出版《侨报·中国科学周报》。我曾到范长江社长的家与他商谈办报事宜。 当年，我们特地赴美国纽约侨报社访问，与侨报社各级领导和同仁进行座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侨报社帮助我们联系了《科学》，我们专程拜访了设在洛杉矶的编辑部，主编热情接待了我们。从此，《中国科学报》开始了与《科学》的长期合作。 其办报方针、内容和经费已经协商确定，《侨报·中国科学周报》确定为 24 块版，编辑部由北京方面负责，印刷发行由美国方面负责，每周四晚传版面。《侨报·中国科学周报》每周五印刷，晚上就放在各大超市的

报箱里，免费赠送。报社领导大力支持，特别给编辑部 4 个编辑的编制和一位专职的录入排版员。编辑部全体成员全身心地投入了采访、编辑和版面设计。经过近一年的准备工作，试刊两期后，创刊号终于出版了。 《侨报·中国科学周报》创刊号在纽约地区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内容活泼，版面新颖，又是科技方面的内容，很受欢迎，被取得精光，还有不少打电话到纽约报社总部索要。中科院原副院长陈宜瑜从美国访问回来，专门给我打电话说李肇星大使提到了《侨报·中国科学周报》，大意是说“科学院这张报纸办得不错”。

每份编辑负责 6 块版面的采访和编辑，他们 5 年如一日，精心做好每一块版。赶上重大事件，常常加班，留出版面，等到事件发生的最后一刻，才编写报道，排版、传输，尽可能及时、准确地把新闻报道出去。 同时，《侨报·中国科学周报》也要为报纸创收。当时我们都积极与有关单位和企业联系，争取经费支持，为扩大企业影响和《侨报·中国科学周报》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侨报·中国科学周报》于 2005 年完成了历史使命，但这 5 年，它对推动中国科技新闻的传播和引进人才，无疑起到了应有作用。

和影响力的深度报道。 首先，针对学界所关心的话题，展开深度解读，特别是揭露问题与潜规则的部分报道，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同时，我们不是为了揭黑而报道，而是努力在报道中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路径，为科技主管部门提供参考。这类文章往往在被科学网和其他科技类网站转载后，成为跟帖热点。 数年间，改版后的《科学新闻》在科学界获得了良好口碑。而我在这里，从一个埋头实验、对新闻业务一窍不通的科研人员，成长为一名守望科学的新闻工作者。

在这里，我学会了科技报道



贺涛 1999—2011 年在中国科学报社工作，任《科学新闻》副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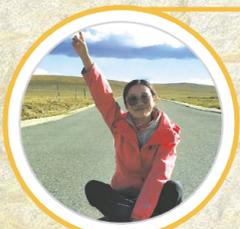
1999 年 5 月，我在大学毕业后第一个东家——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将满两年，作为一名新手实验员，我对从事科研工作的意义理解粗浅，对未来有些傻傻看不清。 就在那个 8 月的清晨，一枚精确制导炸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罹难，数十人受伤。这一消息让记者职业在我眼中的形象一下高大起来，并在我心底埋下一粒小种子。到了夏天，我在《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上看到一则招聘记者的启事，几个月前埋下的种子破土而出，终于在 1999 年 11 月加入采访编采团队。

我为报社服务了 12 年，前 5 年在《侨报·中国科学周报》采编一线；后 7 年在《科学新闻》杂志的采编一线，并逐步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从一线编辑到副总编辑，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说实话，在《科学新闻》的头三年，工作节奏总体放慢。2008 年 8 月，改变的机会来了。报社投入重金，对《科学新闻》进行改版，要在 2009 年元月推出一本服务于科学家的全新刊物。在人才方面，社领导将贾鹤鹏和方玄昌两位资深媒体人延揽进来，分任杂志的总编辑和执行总编辑。我作为副手，扮演辅助和执行的角色，同时采访编采团队从原来的

4 人增加到 11 人，还发掘了十余位热衷科普的在校研究生作为撰稿人。 贾鹤鹏和方玄昌的到来，为《科学新闻》编辑部带来了新鲜的办刊理念，在具体业务上，也更加注重团队培养的专业化、系统化，通过新闻选题会、业务培训、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采编人员的综合素质。工作的节奏一下变快了，加班加点是常态。每逢出刊，采编团队都要熬一个通宵，赶制版面。 在工作中，采编团队密切关注那些科教界关心的公共话题和可以从科学角度解读的社会话题，我参与或策划了很多有建设性

报道来说，是一个选题的宝库。对我个人而言，还加深了对科学研究本身的认识，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在这个领域，科学家一直在呼吁，保护决策应该充分利用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他们遗憾地发现，尽管同行评议的科学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在保护实践中，凭借直觉、个人经验来作决定，仍然占据主流。也就是说，科学本身所发挥的作用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大型哺乳动物、大部分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都在减少、受

在这里，我遇见了“自然”



胡珉琦 从 2012 年至今在中国科学报社工作，为一线骨干记者

粗略统计了一下，近两三年以来，由于版面和栏目的缘故，我在报社写作与“自然”相关的报道不下 40 篇。特别是因为平台提供的机会，让我得以开设了自己的专栏，讲述青藏高原的物种与科学家的故事，甚至有幸跟随科考队一起，真正深入我梦寐以求的荒野。这不仅仅帮我打开了新闻报道本身的窗口，也打开了寻找意义的窗口。 第一次让我真正产生好奇心，想要深入了解人与自然，研究、保护与发展这些复杂关系的，是 2015 年末的一次采访。中国的自然纪录片导演第一次把素有“地

球上最美丽的高山动物”之称的雪豹搬上了中国的电视。我顿时被那神秘又优雅的大猫深深地吸引。 因为这次采访，我正式接触到那些在一线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和实践的科学家。我发现他们和一般的科学家不太一样。他们非常习惯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保护生物学不是局限在生态学领域，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等等。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在保护事业中相互交叉渗透，是对科学家的一种巨大挑战。对科学新闻

到威胁或变得脆弱。进入 21 世纪，我们在如何对待与我们共存了如此之久的其他物种这个问题上，面临着重大的抉择。 我们仍然缺乏非常有效的自然保护措施，很重要的原因是还没能意识到荒野本身的价值，因此，也就没能调动整个社会，把这种公认的价值转化成保护的驱动力。它也让我意识到，这是当下以及未来科学传播中的一项重要责任。 这 3 年来，因为这一系列的报道，甚至改变了一点我的生活。感谢《中国科学报》，让我与她相遇。

报道来说，是一个选题的宝库。对我个人而言，还加深了对科学研究本身的认识，对存在问题的反思。 在这个领域，科学家一直在呼吁，保护决策应该充分利用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他们遗憾地发现，尽管同行评议的科学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在保护实践中，凭借直觉、个人经验来作决定，仍然占据主流。也就是说，科学本身所发挥的作用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大型哺乳动物、大部分鸟类、两栖爬行动物都在减少、受

接力梦想 再创辉煌